

章黃方言研究異同評

汪啟明^{*}、田薺^{*}

摘要

漢語方言研究肇始於西漢揚雄《方言》。他之後的 1900 餘年間，研治方言之作甚少，更無調查當代活方言之專著。自清末民初章太炎始，方言重新得到重視。章太炎提出了完整的方言學理論體系，並進行了方言調查實踐。他的代表作《新方言》一掃過去方言研究重視文獻語言而忽視當代活語言的做法，是用傳統方法調查研究漢語方言的集大成之作。黃侃緊承其師，在方言學理論方面建樹頗豐。他的《蕲春語》既承《新方言》之法，又有自己的特色。章黃二人的方言研究理論和實踐雖一脈相承，卻也不盡相同。文章從方言成因、方言研究方法、對方言求本字的看法三個方面探討了章黃方言研究的異同。

關鍵詞：章太炎，黃侃，方言研究，異同

^{*}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雲南農業大學人文社會學學院講師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ang's dialect research and Huang's dialect research

Wang Qi-Ming^{*} ; Tian Lu^{*}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began in Dialects written by Yang Xiong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more than 1900 years after him, there were few works on dialect research, and no monograph on contemporary living dialect. Starting from Zhang Taiyan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alect has been re-valued. Zhang Taiyan put forwar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of dialectology and carried out dialect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New Dialect has swept away the past practice that dialect studies attach importance to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ignore contemporary living language, which i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that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traditional methods to study Chinese dialects. Huang Kan inherited his teacher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theory of dialectology. His Qichun Dialect not only inherits the method of New Dialect, but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Zhang's dialect study and Huang's dialect study are in the same line, they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Zhang's dialect study and Huang's dialect stud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auses of dialec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ialect, and the views on seeking the origin of dialect.

Key Words: Zhang Taiyan , Huang Kan , dialect study ,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 Professor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 Doctor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 Lecturer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壹、前言

漢語方言的搜集調查始於西漢。有輶軒之使、林侶翁孺、嚴君平肇其端緒，由揚雄集其大成而成《方言》一書。郭璞承揚雄緒，對當時新產生的大量方言現象做了記錄，又對《方言》中記載的方言詞匯存活狀態做了進一步的描寫和補充。此後，以方言調查與搜集為主旨的著作只有寥寥數種。¹方言研究始終作為文字訓詁的附屬而存在。

直至清末民初章太炎始，方言才可以真正名之為「學」。其《自述學術次第》《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正言論》和《煊書》《檢論》中的〈訂文〉和〈方言〉等篇，再加上〈小學略說〉中的相關內容，對方言產生的原因、研究方言的目的、研究方言的作用、研究方言的方法、方言的九大分區、方言轉變的條例，都進行了深入的論述，實為我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方言學理論著述；此外，他還進行了方言調查實踐，完成了《新方言》這部號稱「千七百年來無此作也」的重要方言著作。章太炎的學生，另一位國學大師黃侃則發揚光大，對漢語方言學的理論進行了可貴的研究，並且親自實踐，撰著了《蕲春語》。黃侃的方言學思想，散見於他已發表的論著如《黃侃論學雜著》和《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然而，章黃二人在方言學上是有同有異的。

貳、方言之發生學

一、章黃之「同」：內因和外因

方言形成的原因非常複雜，章黃二人均對其進行過討論。他們關於方言的發生學理論有兩個共同點。

（一）地域差異是方言產生的根本原因。中國自古以來地域遼闊，地域的阻隔，如大山、大河、大的氣候帶、大的行政區劃變動，不僅造成音的楚夏，亦會形成詞的變轉，從而使人們的語言產生差異。故章黃二人均認為地域差異是方言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章太炎在〈小學略說〉中說道：「蓋自軒轅以來，經略萬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若令地望相越，音讀雖明，

¹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74-78。

語則難曉。」²在《國語學草創序》又說：「中夏幅員遼闊，方語不能無小殊。」³《齊物論釋》：「古今異語，方土殊言，其義則一，其言乃以十數。」⁴這就是說同一個意思，不同地方的方言有不同的表達方式。黃侃在〈論音之變遷由於地者〉中則提出：「水土殊則聲音異，習俗變則名言分，雖王者同文，而自然之聲不能以力變也。《漢書·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王制》云：『廣谷大以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淮南五書》云：『清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凡此，皆音由地異之明文也。……漢世方音歧出，觀諸書注家所引可明。……大抵地域之分，南北為其大介。昔《荀子》屢以楚夏對言；至《方言》多載南楚之語；楚辭一篇，純乎楚聲；《文心雕龍》載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余，失黃鐘之正響。』至永嘉之亂，中原入夷，逖彼東南，遂為正朔，自爾南土之音，轉為雅正；雖方言俚語，尚有楚風（《宋書》謂高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此文明言江南音正，楚者特其方語）。」⁵這段話反映了雖然我國語言生活中存在「雅言」或「通語」，文字也是統一的，但由於「水土殊」「水土之風氣」諸地域原因，所以一個詞語在不同地方的讀音本身就存在差異，「不能以力變」，加之因戰亂、政治、民族融合以及商賈、通婚等社會原因，一地人口遷徙到另一地，促使兩地方音融合，以至於「南土之音，轉為雅正」，中原漢語則夷言雜入，方言歧異自然無法避免。

（二）方言口語發音的不同。除地域差異、交通阻隔、人口遷徙等語言外的原因外，章黃二人均指出人發音的輕重緩急、說話的剛柔差異、發音不准等語言內的原因也是方言產生的原因之一。章太炎〈小學略說〉談到：「蓋九州風土，剛柔有殊，輕重清濁，發音不齊。」⁶「古來語言不齊，因地轉變，此方稱老，彼處曰考。此方造老，彼處造考……欲通四方之語，故立轉注一項，是可知轉注之義，實與方言有關。」⁷《章太炎的白話文·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的發達》則謂：「中國有一千六百萬方的地面，同是一句話，各處的聲氣自然不能一樣。」⁸黃侃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分析方言成因時指出，方言成因有三，其一是「偏用」：「人之發音，本為有限，以聲有偏

²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8。

³ 章太炎：〈國語學草創序〉，《國語學草創》（北京：商務印書館，1923年），頁2。

⁴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6。

⁵ 黃侃：《黃侃論學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04。

⁶ 章太炎：《國學概論·國學略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131、112。

⁷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話文》（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1。

用，故韻有偏用，（如武昌人多齒音，山西人多齶音，廣東人多唇音。）意義亦有偏用，（如普稱我，山東曰俺，北人曰咱。）遂形成一時一地之特色。」⁸「偏用」指的是發音不准，聲母可能發音不准，韻母也可能發音不准，由此便形成語音的地方特色，音變逐漸引起義變。

二、章黃之「異」：黃侃對章太炎的發展

黃侃在章太炎的方言發生學理論基礎上有所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黃侃指出，除空間的阻隔外，時代轉換、古今變遷亦是方言形成的另一個根本原因。時空二者之間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截然對立的關係。他在〈論音之變遷屬於時者〉中說：「自古言語，隨時遷異，是故有輶軒之使，採錄遠古之言。子雲《方言》之作，如其《答劉子駿書》所云：『其根柢純本于嚴君平、林閭翁孺所得輶軒之使舊奏；然把弱翰、齋油素，以問諸方人，加以論思而燕其疑。』計漢時，去古未遠，而方音遷變，固已多矣。」⁹他在解釋揚雄《方言》的書名含義時說：「《方言》本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絕代者為時間之異，言別國者為空間之異。而空間縱之則為時間，時間橫之則為空間。故《方言》一書，即解釋古語之書也。南北之是非，由方言而可知之，古今之通塞，亦由方言而可知之也。」¹⁰這就是說，要把時間和空間結合起來，空間的區別有時間的因素，時間的延展要考慮空間的發展。時間與空間互相交錯，方言音轉與古今音轉彼此交融，就形成了地域方言的複雜性。

（二）黃侃認為人口遷徙和語言融合對方言形成有重要作用，並據此提出了方言的層次理論。他認為，方言的形成和特點具有歷史層次性，決不是一個平面的結構。古代的通語，今天可能成為某種方言的成份，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北方貴族舉族遷徙到了南方，把北方的通語也帶到南方；這些當時的通語，今天卻成為各南方方言的底層。正所謂「永嘉之亂，中原入夷，逖彼東南，遂為正朔，自爾南土之音，轉為雅正」。他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舉例說：「如揚子《方言》稱某地曰某，今求之於其地，則無此

⁸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37。

⁹ 黃侃：《黃侃論學雜著》，頁102。

¹⁰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6。

語，反可於他地得之。（北京話以南京語為底，今之南京話以淮西語為底，杭州語本與蘇、常同，今則同於汴、洛，以宋之南遷也）。」¹¹南宋由開封遷都杭州，帶去了大量河南一帶的人口，改變了原杭州方言的面貌，杭州方言吸取了河南口音，形成了新的杭州官話。

（三）語言結構對方言形成也有影響。黃侃從發音特徵入手，指出漢語是單音節語，語速甚緩，加之一地有一地之民風，所形成的方言音可以由個人特色逐漸擴散開來。《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國語言一字一語，費時甚緩，印度語則反是。是彼此時念觀念不同，性躁則高急，性平則和緩，始由一人，終成大化，久之亦不相通。」¹²性急的人講話快，性子平和的人講話緩慢，原本僅是個人特色，但一旦推廣開來，也會成為各地方言不相通的原因之一。

參、方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黃侃的方言研究方法既承自章太炎，又有自己的特色。二人在方言研究中，都以傳統語言、文字、訓詁學為基礎，將歷時文獻與共時方言調查相結合，以古今語言互證，調查記錄今方言並對其進行考釋。

一、章黃之「同」：文獻方言與方言調查並重

（一）從古語中求今方言。章、黃均認為今方言緣自古語，是古語的化石，因此可從古語中考求今方言之根源。章太炎在〈論漢字統一會〉中說：「今之里語，合於《說文》《三倉》《爾雅》《方言》正多。雙聲相轉而字異其音，鄰部相移而字異其韻，審知條貫，則根柢豁然可求。」¹³這就是說，來源於古代文獻的今方言很多，古今讀音之所以不同，是因為發生了音轉，只要清楚音轉規律，就能知道方言詞的根源。黃侃也曾說：「今世方言本之

¹¹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137。

¹²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137。

¹³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20。

遠古，明乎此，則今語之名物皆有所由來，即今語之訓詁亦無不有所由來。」

14

（二）重視傳世文獻。章、黃研究方言，使用的都是傳統的援古證今的方言研究方法，因此重視傳世文獻并大量引用以證方言是他們方言研究中的一個共同點。在《新方言》和《蕲春語》中，他們均大量引用古代文獻材料作為探求方言來源的證據。《新方言》引用最多的是《說文解字》，其次是《爾雅》《方言》《廣雅》，《釋名》《通俗文》亦有涉及，另外也引用了《詩經》《周易》《尚書》《周禮》《禮記》《左傳》《漢書》《莊子》《荀子》等及其傳註。黃侃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也專門提到：「大抵今日方言，無不可徵於小學六書者。次則《三蒼》《急就》《字林》《通俗文》《玉篇》《廣韻》《一切經音義》《集韻》必有其文。」¹⁵小學文獻中，他同樣首推《說文解字》，據牛慧芳統計，《蕲春語》所考方言本字直接或間接出自《說文解字》的有119條，占總數的84%¹⁶。

（三）考釋方言詞注意時序。《新方言》和《蕲春語》二書在考釋方言詞詞義時常先以古字書為根據，然後引證經典，再聯繫當代通語或方言，逐層演繹，條理清晰。如《新方言·釋言》：「《說文》：紉，圓采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反紉察之。楊倞曰：紉與循同。《榮辱篇》作反鉛，《禮論篇》同。凡圓轉反覆，多致相戾，如紉字《說文》訓轉，亦可訓戾，是也。杭州謂戾為紉，讀如訓，皆從川聲也。」在考釋「紉」字時，章太炎先引《說文》，再引他書書證，最後標註今方言的通行區域及音義。《蕲春語》考釋方言詞時，也同樣注意時序。如《蕲春語》：「《說文·蟲部》：蚋，蛸蟪也；《方言》十一：蚋蚋，自關而東謂之蚋蟪，或謂之蜚蟪。蚋蟪、貂聊二音；蜚音帝。《廣雅·釋蟲》：茹蟪，蛸蟪也。《夏小正》：『七月寒蟬鳴』，傳曰：寒蟬也者，蜚蜚也。郭註《方言》云：江東人呼蟪蟪。案蛸、蚋、茹、蜚皆雙聲，蟪、蟪、蜚亦皆雙聲，蛸蟪、蚋蟪、蟪蟪皆疊韻，隨音作字，要一名耳。今北方謂青色小蟬六七月間鳴者，曰蜚蟪，音低了。《本草》蚋蟪，陶弘景註曰：七月鳴者名蛸蟪，色青；是矣。吾鄉謂之蟪蟪，蟪讀若溜。」要之，從《說文》出發，考據方言是他們的相同之處。

（四）注重方言調查。古代方言著作，重古書訓詁，輕方言調查。正如

¹⁴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263。

¹⁵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138。

¹⁶ 牛慧芳：〈黃季剛方言學理論及實踐研究〉，《湖北社會科學》第12期（2018年），頁136。

陳尚君、張金耀所謂：「中國古代語言學重古語、通語、書面語，輕今語、方言、口語。幾乎所有的方言著作，都是為了古書訓詁，而不是為了活的語言規律的探求。」¹⁷方言之田野調查，記錄實際方音情況，這些現代方言研究的基本手段，即便是語言研究的高峰時間如清代，除錢大昕、郝懿行等人有少量「目驗」外，涉及較少，從清人方言著作可知其端倪。章太炎亦注意到這一現象，批評前人「小學之道趨於道古而止」的態度。他評論杭世駿、程先甲的方言研究：「自揚子雲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勿能為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¹⁸表達了對於杭、程二家研究方言時只收錄資料，收集了資料，既不在古代文獻中查根尋源，又不聯系今日活的方言的不滿。又指出錢大昕研究方言，只取書面例證，不從語言文字的角度進行研究，翟灝的《通俗篇》雖然懂得從語言角度研究方言，但只以唐、宋以後的資料為主，沒有追尋其最早的形式：「錢曉徵蓋志輶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遠，及其作《恆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為徵，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柢。仁和翟灝為《通俗編》，雖略及訓詁，亦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於古訓藐然亡麗。俄而撮其一二，又樞不理析也。」¹⁹

因此，章太炎按照揚雄的方法，親力親為調查方言。他曾在《民報》上說：他「前著《新方言》一冊，收集 370 余條，近復輾轉尋考，又發現百余條，」然「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對於所得的方言，他也并不是有聞必錄，而是以自己淵博的常識加以甄別，力求準確。如〈丁未與黃侃書〉：「前得蕪州方言二紙，佳者即采入《新方言》」。²⁰正是由於章太炎調查方言的態度嚴謹，《新方言》在方言詞彙調查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調查的方言詞數量較大，涉及到的方言地名較多，記錄的方言詞也不少。據孫畢統計，《新方言》共記錄古、今方言詞 2470 個；描述今方言詞時有的用大方言區來劃分，有的按照自然地域方言的分佈情況劃分，更多的是以州縣為單位，涉及地名 167 個，共出現 1303 次，；除通語、南方語、北方語、民族語外，《新方言》還記錄了 15 種漢語方言。

方言的形成、發展變化，主要表現在方音的發展變化上。在方音的記錄

¹⁷ 陳尚君、張金耀：《四庫提要精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63。

¹⁸ 章太炎：《章氏叢書——新方言》（杭州：浙江圖書館校刊，1917 年），頁 1。

¹⁹ 章太炎：《章氏叢書——新方言》，頁 1。

²⁰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頁 46。

與分析方面，《新方言》較《方言》大有發展。周振鶴、遊汝傑指出：「《方言》的不足之處是：只限於記錄部分詞匯，缺少對語音的敘述，所謂僅『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顏氏家訓·音辭》），不能反映漢代方言的全貌。」²¹而章太炎記錄方言時則注意避免《方言》這一遺憾。他繼承了乾嘉以來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郝懿行等樸學大師在音韻研究方面的成就，用音韻貫穿文字、訓詁。周振鶴、遊汝傑認為其方言研究之所以超越清儒，亦是因為他「從音韻演變來考釋詞語的演變，把方言的音、義結合起來研究。所謂『疑於義者，從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求之』」。²²《新方言》明確描寫了 405 個方言詞語或短語的語音，記錄了很多今通語詞的語音和地區方言詞的語音，還歸納了一些方言的語音特點。²³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章太炎將漢語分為九大方言區，這是他的首創。同時粗線條地勾勒出這九大方言區的大致輪廓以及特點。與李榮、丁聲樹的八大系及現在得到學術界公認的十大方言區多數相同，有的是他將一些次方言區上升為大區。在《國故論衡·正言論》中，他還以古音為標準，劃出了同言線，這也是他的首創。

黃侃同樣重視方言調查。他曾參加章太炎《新方言》的資料搜集工作：「季剛昔為我次蕪州語及諸詞氣，復以新所診發者弟為十篇，都八百二十餘事。」章太炎就方言研究工作對黃侃寄予厚望：「季剛年方盛壯，學術能為愚心稱適，又寂泊願握苦節，此八百事，賴季剛枕大之。」²⁴黃侃曾舉例說：「如今南人謂北方無入聲，並引《中原音韻》不載入聲為證。實則北方非無入聲。《中原音韻》不載之者，特以其不便歌唱；而今證其必有者，以治小學知之耳。」²⁵「中夏音變，良非無故，即有不合於古，亦不得謂之訛音。蓋文人書別字則有之矣，而鄉人操別語則無有也。」²⁵也就是說，或者由於個人因素，或者由於文人因素，文獻記載可能與方言的實際情況有差異，如果僅以文獻記載為方言研究對象，而不進行方言調查，那麼得出的結論可能不正確。黃侃所作《蕪春語》共搜集方言 141 條，229 個詞目，這其中除了蕪春語外，還有他處方言和通語。孫畢曾進行過統計：「今通語（今、今語、今通、今世、今世通）24，俗語 2，恒言 2，今鄉俗 4，今諸鄙語 1，北方 4，

²¹ 周振鶴、遊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0。

²² 周振鶴、遊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頁 11。

²³ 孫畢：《章太炎〈新方言〉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79。

²⁴ 章太炎：〈題所撰初本《新方言》予黃侃〉，《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286。

²⁵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 11、82。

南人 1，吾鄉（蘄春）160，（吾鄉）近溪水 1，武昌 2，北京 11，河南 1，揚州 4，四川 2，漢口以南迄長沙 1，四川以東 1，貴州 1，江蘇 1，閩中 1，蜀人 1，海寧 2，蜀語 2。……除今通語、俗語、恒言、今鄉俗語、今諸鄙語外，包括 17 個方言地點或區域。」²⁶經我們復查，「北方」應該是 3 處。

《蘄春語》中同樣對方音進行了描寫，和《新方言》一樣使用了傳統音韻學的記音方法與術語，如直音、反切和譬況注音等，對方音的語音特點也有概括。如《蘄春語》：「《廣韻》入聲十三子末：『抹，撥摩也。』今北京語調衣既褻縐，復整理之，為濺滅，音如麻沙。古語有摩抄、挾莎，皆此一語之轉爾。吾鄉謂之摸，讀慕。」²⁷即使雅言中有語音變遷，也是因方音而起。黃侃說：「聲轉之變，由於方言；韻轉之變，本乎方音。故聲轉、韻轉變易，易與孳乳相溷。」²⁸此語確為的論。當然，語音的發展不是沒有規律可尋，如「蠶讀蜀郡布名，而布名之字實應作縛，此可知由曷轉入寒矣。」²⁹曷、寒在上古音中正為韻部對轉關係。

二、章黃之「異」：「時」「地」「序」

（一）在傳世文獻中，章太炎更看重上古文獻，而黃侃則上古文獻與中古文獻並重。章太炎在《新方言》中大量引用了《說文》《爾雅》《方言》《廣雅》等較古文獻，很少引用以《廣韻》為代表的中古文獻。而黃侃的《蘄春語》中，除引用上古文獻外，還大量引用了《廣韻》《集韻》《唐韻》《經典釋文》等中古文獻。當然，黃侃是以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看待《集韻》等中古韻書在考察方言中的作用的。一方面，他特別重視《集韻》，認為研究方言，必須參考《集韻》：「韻書以《集韻》為最完具。」³⁰「看《集韻》宜通《經典釋文》及顏師古《漢書注》，今日考究方言，必用《集韻》。」³⁰另一方面，他也指出，韻書只能作為參考，而不能過分依賴。因為韻書主要是為詩人作詩押韻而著，其宗旨為嚴整一律，它是從文獻中而不是從口語實際用韻中歸納而成的。因此韻書與實際用韻存在差異，使用韻書研究方言要注意實際讀音與書面記載的差異。如《廣韻》一書，「大抵聲多韻多等多，皆非一時一

²⁶ 孫畢：《章太炎〈新方言〉研究》，頁 283。

²⁷ 黃侃：《黃侃論學雜著》，頁 411。

²⁸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 31。

²⁹ 黃侃：《黃侃論學雜著》，頁 108。

³⁰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 172、176。

地所能完備。二百六韻、五十一聲合全中國之音而後有之，責之一方一地而皆能發其音，此事之不可能者。」³¹黃侃主張，在方言研究中不應以韻書廢其他文獻，也不應以其他文獻廢韻書，更不能把韻書記載的語音就當成實際的口頭音。他指出：「古時韻文及今里巷歌謠，但取諧調，不皆合於音韻嚴整之律（古時用入聲韻往往不拘部分）；又方土異音，各據己所諧調而用之，不必通於他地，其用韻最為寬泛。」³²也就是說，韻文、民歌等用韻甚寬，不能拿韻書去套，更不能用後人的韻書去套前代的用韻。

（二）章太炎更重視上古方音對今方音的影響，而黃侃對上古方音和上古方音同樣看重。章太炎提倡以古韻書中的音讀重新厘定因遞相嬗代而流轉殊異的當今方言的「正音」方案，認為「今之殊言，不違姬漢」。他在《新方言·音表》中列出上古聲韻系統及聲韻相轉的內容，並明確指出「古今音既非大異，故亦如律分配」。黃侃注意到現代方音的形成是時空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現代方音中含有各個不同時代的音韻層次。他指出：「今世之方言本之遠古，明乎此，則今語之名物皆有所由來，即今語之訓詁亦無不有所由來。」³³所以他的《蕲春語》在考察方言詞時，往往先列出該詞從上古到中古各個時代的音注，然後明確指出今方音存古的具體時代，其中記錄了大量與《廣韻》音合的方音。

（三）黃侃還提出由今及古，研究古方音應從今方音出發，古今貫通方能全面考察方言詞的技術路線。他在《蕲春語》「脢」字條下寫到：「三古遺言，散存方國，考古語者，不能不諗之於今。考今語者，不能不原之於古。世之人或徒慕艱深而多書古字，或號稱通俗而昧於今言，其皆未為懿也。」³⁴《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也表明：「考古音者，一貴明古音之原，一貴知今音之變，語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明考古又貴知今。疏別音理，專持秦漢古書，必為癡騃之士。」³⁵這說的是考古音不可拘泥於古書，要從古音出發，上探語源，下明流變，一味沉溺古書，不智，不能做「專持秦漢古書」的「癡騃之士」。並具體舉例說明：「欲明古音之異同，必先於今音能深切認識，以為階梯，而後可以入古矣。言今音者，不外求諸方音，以為古音之證。今日南北音之不同處，在正齒諸母之異讀。如照、穿、神、禪，古

³¹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132。

³²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118。

³³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263。

³⁴ 黃侃：《黃侃論學雜著》，頁413。

³⁵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81。

今皆讀舌音，而于唐宋人書則屬之齒。莊、初、床、疏，古為齒音。今則南讀齒音，北讀舌音。又如文字微字今多讀喉音，古讀唇音，而從微之徽，本有喉音。蓋古今聲音雖有轉變，而其條理自可推尋，善用之者，即假今以治古可矣。」³⁶這裏，黃侃以聲母變轉為例，說明古齒今舌，又以莊組為例，說明古齒而今南齒北舌，他甚至注意到古唇音、今喉音之間也有轉變的情況。

（四）《新方言》與《蕲春語》。二者相較，有數事可以留意。

1、方言搜集對象不同。《新方言》的方言詞搜集面向全國，所以搜集到的方言詞數量很多。章太炎搜集方言的動機是希望能「精如揚子」，將各地方言俗語「輯為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發思古之幽情矣。」³⁷而《蕲春語》主要搜集蕲春一地的方言詞，蕲春以外地方的方言詞涉及不多，地域的限制使得《蕲春語》收錄的方言詞數量僅為《新方言》的十分之一。

2、方言詞分類不同。《新方言》輯錄詞條 859 條，按《爾雅》《方言》《釋名》分類法，分 11 個門類：釋詞第一 89 條，釋言第二 415 條，釋親屬第三 25 條，釋形體第四 54 條，釋宮第五 27 條，釋器第六 145 條，釋天第七 11 條，釋地第八 13 條，釋植物第九 22 條，釋動物第十 58 條，音表第十一。而《蕲春語》沒有特別為方言詞分類。

3、引文出處的標注不同。《新方言》引用古代字書、韻書往往不標部首、韻部，部分引文不標篇名，給後人查證原書造成了困難。如《新方言·釋形體》：「《釋名》：駢，頭生創白瘡如駢然也。《玉篇》：駢，胡割切，鬪也。《廣雅》：癩、鬪並訓傷，鬪之言鬪也。今自淮、漢而南謂頭生創白瘡蒙茸者曰癩子，與駢同義；因而致禿亦曰癩子，自河而北直言禿子。」《蕲春語》彌補了《新方言》在這一方面的遺憾，它的引文既標引書名，也標部首、韻部或篇目名。如《蕲春語》：「《說文·竹部》：菌，地蕈也。《爾雅·釋草》：菌，小者菌。《廣韻》十六軫：渠殞切。吾鄉凡菌皆曰菇，亦或作姑；惟桑蕈，曰木耳；其生樹上似釘蓋者，曰香蕈，亦曰香菇。」

4、方言分區不同。我們注意到，黃侃根據文獻方言分為南北兩大區，「大抵地域之分，南北為其大介」³⁸，與章太炎的九區有所不同。

³⁶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 117。

³⁷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頁 156。

³⁸ 黃侃：《黃侃論學雜著》，頁 104。

肆、對方言求本字的看法

章太炎研究方言，以求本字為己任。他在〈丁未與黃侃書〉中說：「竊調理董方言，在證明其難知者，不在疏舉其易曉者。僕于不中用、不了了諸文，並刊剟不入錄，義乃在是。……是雖方國通言，猶必刺取以見語柢，其有吊詭殊言，已見史傳，而求之訓詁，莫能明其本株者，一切棄之如遺。」³⁹這段話中的「語柢」既是詞源，也是本字。如果方言不能追根尋底，不能講清楚本義與引申義，即「明其本株」，則不進入他的研究視野。他在《新方言序》中再次強調其考本字的重點是「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對於一般易懂的常用語，如「不中用」「不了了」等都不在其考察範圍之內，他強調考方言、考本字應該運用聲音演變規律，即「察其聲音條貫」，到《爾雅》《說文》《方言》等上古文字訓詁書中探尋其來源。如果從今天的眼光來看，他的考本字之法忽視了甲骨文、金文以及民族語、外來語的證據，對於複音詞則將其拆開，分別求本字，這樣的研究方法使得他的求本字具有局限性。章太炎研究方言之所以執着於考本字，與當時學界的復古主義風氣有關，所以這一時期「人們對方言的興趣多在於考證本字和詞源，企圖從方言俚語中搜集發掘古語的遺留，以說明『今之殊語，不遑姬漢』。」⁴⁰

黃侃對方言求本字同樣重視。他指出：「聲韻本流轉之物，方言須求其不轉者。」⁴¹此處之「不轉者」即方言本字。章太炎著《新方言》，黃侃曾為其提供若干條材料，並在《新方言後序》中評價其「博諏代語，曲明聲類，令古文隱義，悉得符驗。……已陳之語，絕而復蘇；難論之詞，視而可識。」可見，黃侃對章太炎求本字的成就是認可的。但是對章太炎處處從古代字書中尋求本字的研究方法卻提出了不同看法。黃侃認為，古代記錄方言的用字情況非常複雜，記錄口語時，方音唇吻稍轉，便與意義絕遠。雖然方言詞一般都可以從歷代典籍中求其本字，但不可率意為之。他指出：「考求今世方言，如欲推求本字，須有明證。徒依聲類求之，究難專輒斷定。以音理相近之字，其意義多有可通之處，如一通假字，既指一文為本字矣，雖更一文以為本字，亦可成立。故求本字時，不能拘定一本。又云：章君制《新方言》，

³⁹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頁158。

⁴⁰ 華學誠：〈漢語方言學史及其研究論略〉，《揚州大學學報》第1期（2002年），頁63。

⁴¹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171。

而據聲類以求方語，非無一二精到之說，而比附穿鑿者實多。雖余亦自愧其往日之為也。竊謂推尋本義，非熟精音理，求之明證，未可率爾妄為。苟曰取適私衷，則後之人賢于王懷祖者眾矣。（王氏《廣雅疏證》專事搜求義證，而不推求本字）。⁴²黃侃認為，王念孫不求本字強於章太炎的「徒依聲類」求本字，也就是說，要為方言求本字，應該有確鑿的證據，僅僅依靠語音探求是不可靠的。況且語音本來處於不斷變動與發展之中，不能簡單地「以意推求」，他認為方言詞語，在古代文獻中「必有其文，但必須音理密合，始為得耳」。⁴³「音理密合」，不僅是講語音發展變化的規律性現象，也是講要注意發展中的非系統、非規律性變化。此外還要結合語言外部的原因，如行政區劃變動、政治經濟發展、移民與戰亂、地形與交通等，把語音的變遷線索明晰化，才能求得正確的方言用字。黃侃還專門著有《求本字捷術》一文，設定了古音同、近、轉的種種條件，雖然不盡為方言求本字而設，但其原則完全可以用以研究方言。

伍、結語

黃侃師事章太炎，承其所學，在方言研究各領域受其影響，一脈相承。於方言成因、方言研究方法、方言求本字諸方面，兩位巨匠均有相同看法。方言成因方面，認為地域差異是方言產生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人發音的輕重緩急、說話的剛柔差異、發音不准等語言內的原因也是方言發生的原因。研究方法方面，他們都認為今方言從古語發展而來，以不同形式保留古音古義，因此可從古語中考求今方言詞之根源與發展端緒。在考證方言詞時主張重視傳世文獻，尤其是《說文解字》；考釋方言詞時注意時序，均以古字書為出發點，然後引證經典，再聯繫當代通語或方言，逐層演繹，條理清晰；同樣注重當代活方言的調查，並使用傳統音韻學的記音方法與術語對方音進行描寫。方言求本字方面，兩人都很重視古音的重要作用，就古音求方言，進行了考本字實踐。

同時二人之間也有區別。方言成因方面，黃侃在章太炎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他指出，除空間的阻隔外，時代轉換、古今變遷亦是方言形成的另一個根本原因，時空二者之間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截然對立的關係，而是

⁴²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 263。

⁴³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頁 138。

交錯影響，互相滲入；另外，黃侃認為人口遷徙和語言融合對方言形成有重要作用，並據此提出了方言的層次性理論。他指出方言的形成和特點具有歷史層次性，決不是一個平面的結構；再者，黃侃認為語言結構對方言形成也有影響，他從發音特徵入手，指出漢語是單音節語，語速甚緩，加之一地有一地之民風，所形成的方言音一旦推廣開來，也會成為各地方言不相通的原因之一。研究方法方面，在傳世文獻中，章太炎更看重上古文獻，而黃侃則上古文獻與中古文獻並重，同時，黃侃採用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看待《集韻》等中古韻書，將其作為參考而不過分依賴；章太炎更重視上古音對今方音的影響，而黃侃對上古音和中古音同樣看重；黃侃還提出研究古方音可從今方音出發，古今貫通方能全面考察方言詞。求本字方面，章太炎方言研究的重中之重即求本字，其考本字的重點是「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不考常用語，考本字方法是運用聲音演變規律，到《爾雅》《說文》《方言》等上古文字訓詁書中探尋其來源；而黃侃對章太炎處處從古代字書中尋求本字的研究方法卻不盡讚同，他認為，雖然方言詞一般都可以從歷代典籍中求其本字，但不可率意為之，求方言本字應該有確鑿的證據，僅僅依靠語音探求是不可靠的，「音理密合」方為求本字之法。

可見，對於章太炎的方言學思想、理論和實踐等，黃侃並不是全盤吸收，而是吸取自己覺得有真知灼見的部分，對可以商榷的部分則提出不同的見解。因此，二人的方言研究雖一脈相承，但是也存在差異。

參考文獻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章太炎：《章氏叢書——新方言》，杭州：浙江圖書館校刊，1917 年。
-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話文》，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章太炎：《國學概論，國學略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
- 黃 侃：《黃侃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
-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 胡以魯：《國語學草創》，北京：商務印書館，1923 年。
- 趙振鐸：《訓詁學綱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 華學誠：〈漢語方言學史及其研究論略〉，《揚州大學學報》，2002 年。
- 汪啟明：〈黃侃方言學思想表微〉，《漢語史研究集刊》，2009 年。
- 汪啟明、羅業愷：〈蕲春語與四川方言〉，《項楚先生欣開八秩頌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 汪啟明：〈中国现代方言学的拓荒者〉，《語言之旅》，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 孫 畢：《章太炎〈新方言〉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張子才：〈章炳麟的《新方言》〉，《辭書研究》，1987 年。
- 牛慧芳：〈黃季剛方言學理論及實踐研究〉，《湖北社會科學》，湖北：湖北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